

论朱天文《巫言》中的书写特色以及“边缘人”的身份追问

耿子惠

(香港都会大学(原香港公开大学)中国文学系 2020 研究生)

一. 绪论

朱天文的创作生涯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从开始的走出眷村到中期的身处台北以及后期构建的美学乌托邦世界,她以擅长的主观感知体验为立足点着重刻画台北与大陆两地的空间架构与群体的历史记忆。

作为台湾外省二代作家,朱天文从出生起就带着不同于本省作家的特殊烙印。在原乡的追慕,身份的追寻中印刻下个体自我生命的根源,留存下情感归属的凭据,融入了文化香火的寄托。本文以文本分析为主,在追溯台湾发展历程和以对“巫”本身以及代表的群体的解读基础上,挖掘朱天文在小说中所着重呈现出一如既往对于“边缘人”的群体性描述以及她蕴含其中的自我身份认同与建构。

二. 离题叙事中的“边缘人”

《巫言》难见一条完整的时间线,一切均以碎片化的方式铺开在读者眼前。擅长讲述的叙述主体一改往日的线性阐述,转为跳动表达,本就是刻意为之。两点一线的固有小说铺叙套路无法满足于朱天文对于时空转换的重新塑造,她渴求以多条活跃的故事线形成更多未知的交点,从而进一步构架出一个看似与现实世界毫无关联实则却蕴含千丝万缕联系的空间。同时时空的跌宕带来的也更加丰厚的生命认知与个体体验,一如她自身在故事情节的发展中不断暗示着内心的想法,离题书写更是作为特有的带着朱天文个人色彩的创作手段被业内所普遍认知。

在《巫言》的众多章节中都不难见“边缘人”这一特殊群体,作者更是毫不吝啬挥洒着自己对于他们的关注。但与其说是对他们的关注,不如是对自己身份的叩问与对这块养育自己的土地的追索。值得注意的是这一题材不是朱天文创作世界中的偶然之光,而是几乎延续了她写作生涯中必然存在的主体,因而有学者自然认为甚至可以将《巫言》中的边缘人们视为《荒人手记》与《世纪末的华丽》中的米亚与小韶的转世,只不过前者尚带有身处荒凉旷野却不无热切的呼唤与寻觅,后者则是带着鲜明女性主义的借着女主之口传达出重建文明之根基的视角,¹而在《巫言》中的边缘人不再被作者局限于同性恋或者女性群体这样特殊的身份,反倒是呈现出更加鲜明的个体化特征。

此外,这些边缘人真的可以完全割裂自己与现实社会的诸多联系吗?故事的一开头表面上似乎一语成谶“你知道菩萨为什么低眉,是这样的,我曾经遇见一位不结伴的旅行人。”²“他不涉入,不威权,不温情,他只对他们陈述事实。”³朱天文大方直接强调着叙事者的主体地位,这样的直接体现在能被读者清晰感知到的“巫”,“菩萨”,“不结伴的旅行人”和社会“左边的人”,他们都是“边缘人”。但“巫”也好,“菩萨”也罢,实则都是站在第三者的角度抒发自己的感受。所谓的“低眉”带来的视角,充满着对这个世界的悲悯,在文中叙述者自己都认为身处人类的发展视角下“如文明的拾荒者,在垃圾桶中筛选出他的财富。”哪怕置身事外,却依旧心怀想救赎现世的念头。进而以某种具体而强烈的愿望作为突破口,企图从内而外构建一套更加丰沛的生命体验系统。

三. 历史变迁下的原乡认同

谈到台湾文学的流变,原乡存在于几乎每一个本省和外省作家的作品中。从古至今史书记载的台湾命运多舛,千万移民与遗民有如水面上的浮萍一般,苦苦挣扎着一边寻求着两岸各自的身份认同,一边饱受着与自己故乡长期离散而无可逃避的伤痛。原乡自然

而然也就成为了台湾文学中一个镌刻着生命体验,熔铸着时空记忆,承载着族群历史的具有丰富内涵和美学意蕴的话语概念。⁴

朱天文将自己的不适,退让与迷惘融入了《巫言》的创作过程中,“我”的老妈,一个生活在充斥着现代科技生活元素中的老太,竟因为出门取款而引发一连串令人啼笑皆非的事情。

“站桂树枝子低低里,目送老妈走出幅盖甚广的树阴直走到烈日下,而就在那阴与日的交界,时间震颤了一下,我看见一个不同于阿法南猿的人属直立原人走出去,抑或那位三百万年前的娇小露西?”⁵

表面充满喜剧特色,貌似只是点到她跟不上时代发展的脚步,反面实则溢满无奈与彷徨,即试图讨论个体裹挟于飞速发展的城市文明中所表达出来的不适与无奈,也正是因为这份不适与无奈的存在,这群并非孤单的个体默默站在了城市发展的另一面,自觉选择用沉默的疏离来完成最后的对抗,巫言也转化为了无言。这样的时空转变自然而然也就不断拉开着家和街的距离,这样的距离更逐渐内化为一种显而易见的脱离感,成为《巫言》的内核线索之一。就是通过文中这种不自觉流露出的细节描绘中,朱天文将自己逐渐归为了她笔下所创建的“边缘人”群体。

四. 回顾

回归至故事本身而言,结构上的安排彰显着作者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看似模棱两可实则坚定选择的态度,朱天文一方面摆脱了张爱玲与胡兰成对自己的深沉的影响从而使自己笔下的世界逐步净化为充满朱氏风格的,另一方面她也难逃这二人创作风格对自己潜移默化地浸润,正像弥漫在字里行间的苍凉与厚重感,以及多次涉及的物置置换与空间转换。

面对无法逃避与阻碍的现实,朱天文将自己化身其中,坚定成为了一个站在最左边的人,这种坚定一如她自己对于文字力量的信仰。她不愿被这个日渐乌泱糟粕的社会所同化,守护着内心信仰的同时没有去过度与这个世界抗衡,因而难得保留下一份带有朱氏特色的柔软与细腻。她始终为自己身披着一层文化救赎者的外衣,试图区分信念中的文学与现实的文学,进而维护着前者的纯粹。但这样的维护却多少带着几分曲高和寡的意味,终究无法被占大多数的肉体凡胎们用自己简单的意识所接受,因此隶属于她的文学的土壤相较于其他家所有的,有几分干涸,也是情理之中。

有人认为结合她在《世纪末的华丽》与《荒人手记》的综合表现,在这部历时七年终成书的摒弃了诗化手法而创作的小说中,朱天文已然有些黔驴技穷。但我认为不得不承认的是,朱天文在追寻着以碎片化的书写方式与自己的理想拯救着这个支离破碎的时代,妄图使其恢复完整。这个被物化时代化异化的原乡乌托邦承载着她更多有关于自己的询问。

参考文献:

[1]王丹丹:(记忆空间:台湾外省第二代作家的原乡言说与身份追寻——以苏伟贞,朱天文,朱天心,张大春,骆以军为考察中心),《华文文学》,2020年04期,页39-45。

[2]朱天文:《巫言》(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

[3]王小平:(台湾知识人身份的自我界定——论朱天文《巫言》的智性书写),《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03月33期,页199-227。